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01-03672-6

Ⅰ.近… Ⅱ.天… Ⅲ.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记—
天津市—近代 N.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87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022-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字数:222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22.00 元

总 序

黄炎智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转瞬间本世纪行将结束，新纪元即将到来。在世纪之交，回首天津百年之历史，真可谓沧桑历尽，覆地翻天。自明朝设置天津卫以来，至本世纪末，天津尚不足 600 年历史；但自上世纪末至今的百余年间，天津却饱经风霜，从外辱内患到阅尽人间春色，特别是上世纪末叶至本世纪中期，天津作为京畿门户、海防重地、北方经济中心，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很多著名历史人物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曾几何时，各路豪杰在此舞旗弄潮，各方志士在此砥砺图强。于是，军事救国者有，实业救国者有，教育救国者有，科学救国者有……芸芸众生，不一而足。然而大潮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仁人志士风云际会于津门外，也有来此淘金的、冒险的、寓居的、醉生梦死的。正是这种珍珠与鱼目的共存，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近代天津，天津也因此而名传天下。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天津的发展更是如此。纵观百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活跃在天津这个舞台上，从不同侧面或者推动、或者阻碍天津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把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将其真

实地再现,人们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而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过去,了解天津。有鉴于此,1996年下半年,首先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汤洪、方兆麟等同志提出来编辑一套“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设想,我对他们的设想十分赞赏,随即提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讨论,经过谢天培、南炳文、孙维甫、乔维熊、杨大辛、田桂林诸同志的充分研究,认为这件事不仅可行,而且十分有意义,对于宣传天津、进一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很有必要。同时一致推举我任该丛书的总主编。我当时作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于是这个设想被正式定下来,列入工作计划。为了使这个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由我主持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具体研究编辑方案。参加第一次座谈的同志有张澜生、徐景星、罗澍伟、乔维熊、杨大辛等同志,大家兴趣很高,七嘴八舌一下子提出了近20个选题。经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编书的宗旨、编辑体例,确定了首批编辑书目。同时也确定了担任这套丛书各分册主编的原则。大家认为各分册主编应尽量由熟悉选题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

然而编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不仅要组织人力,还要下很大力量去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出版这套丛书要有经费,有了“经济基础”这项工作才能有保证。为此,我让文史办公室尽快起草个申请专项经费的报告,并将报告立即转报给市政协主席刘晋峰,晋峰主席很快将此件转市政府张立昌市长。立昌市长非常重视此事,很快批下了经费,从而使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了保证。经过各方面近两年的努力,现在终于看到这套书要陆续出版了,怎能不令人欣喜!可以说,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首批确定的6个选题,即近代天津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寓公、买办和京剧票友。在编写过程中既考虑到了其史料价值,同时又注意到了内容的可读性。每本书收录10人左右,都是经过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研究后筛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各书的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物做了翔实、生动的记述,从而使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周学熙是如何兴办北洋实业的?范旭东是如何创制出“红三角”牌纯碱的?宋斐卿是怎样纺出“抵羊”牌毛线,并使之行销全国的?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是怎样兴办南开教育的?民国初年林墨青是如何兴办社会教育的?收藏家张叔诚是如何得到无价之宝“窑变观音”、最后又怎样被毁掉的?夏山楼主韩慎先除了是“名票”外,他在鉴定与收藏文物方面有哪些“绝活”?北洋时期的总统、总理及一些大军阀下台后来天津干了些什么?清末宫廷大太监“小德张”出宫后在天津怎样度过了他的晚年?天津京剧名票“三王”对京剧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是哪些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等等、等等。我相信通过书上那生动、翔实的描写,不仅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个丰满、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且还可以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佚闻和趣事,而这些恰恰是在一般历史书籍中难以看到的。这些历史人物虽然生活在天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局限于天津,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侧面,因此这套书对于学习中国近代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天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地充实这套系列丛书的内容,陆续向读者推出新的书目,如天津著名的商人、著名的银行家、著名的报人、著名的曲艺家、影剧名流、社会名流等等。总之,我

们将通过这套书使读者更加了解天津、认识天津,也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同志参加到编著这套丛书的工作中来,为发展天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套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是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各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收集资料,由于他们的努力为成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再者,是各书的主编们,他们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各自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之余,积极策划,审定稿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粗取精,去虚存实,才使这些书能顺利付梓。还有这些书的责编与出版者,也都花费了不少精力,一遍遍的审校,使这些书能最后出版发行。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特别是在历史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和谅解。

谨将此丛书作为世纪之交的献礼,愿人们接受它!

序

徐景星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是个水陆码头。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天津作为一个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互相撞击，互相渗透；周边农村的农民和灾民大量涌入，使内地乡村文化不断汇集城市，与市民文化相融合，逐渐演变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初步萌发了社会参与意识，希望通过报纸了解世界，获取新知识，启迪民众。北方最大通商口岸的天津，教育发展程度“为通商各属之冠”，创办报纸不仅是应时之举，更是迫切的社会要求。20世纪初年，报纸杂志由数种猛增至五六十种。到了1931年天津报纸发行量达29万份，除发往外地10万余份外，市内流通18万余份。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口计算，每天平均2.5人拥有一份报纸。

旧社会的这些报纸，虽然各自代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个性；但也有其共性，即资本的私有性与产品（即报纸）的社会性。报纸本身是有价商品，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质量好坏决定它的销路。报纸的质量就是它的内容，

报纸的内容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合拍，人民就喜爱它；反之，就抛弃它。

解放前的五六十年间，天津有上百份大小报纸交替登场，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报人，他们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

作为报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报社的笔政，必然要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各自表现自己。从天津报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选取不同类型的有代表性的报人，编为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一种——《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可供选择的对象过多。

辛亥革命以前，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是中国人在天津创办较早的一份中文报纸，其主持人英敛之足以作为那一时期报人的代表。他首倡报纸用白话文，尤属难能可贵。同时期的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译著《天演论》，名声超过英敛之，但严复主要活动在政治方面、学术方面，所以仅取英敛之。

二三十年代是天津报业最盛时期，有《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四份对开大报，《晨、午、晚报》、《新天津报》、《评报》等几十份四开小报。报人涌现何止百人。本书以《大公报》为大报代表，选取“论坛宗师张季鸾”、“报业巨子胡政之”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前辈；又从当年天津广大市民十分熟悉的“报界三刘”（刘孟扬、刘髯公、刘霁岚）中选出一位“骂敌殉报的刘髯公”；从多年编副刊的“三吴”（吴秋尘、吴微哂、吴云心）中选出“文苑奇才吴云心”；另一位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不平常的报人周拂尘”。

这个时期，天津还有多位当时报界已出名或以后在其它方面有影响的报人，如《大公报》的曹谷冰、徐铸成、汪桂年、萧乾、范长江、孟秋江等，《益世报》的唐梦幻、罗隆基、谢幼圃、马彦祥、

生宝堂等,《新民意报》的马千里、孟震侯,《商报》的邵光典、秦丰川,《东方时报》的萨空了,在各报发表连载小说的刘云若、宫白羽,为各报画漫画的赵望云、高龙生、冯朋弟,写天津民俗掌故的戴愚庵(娱园老人)、李燃犀(大梁酒徒),还有《博陵报》的刘震中、《中南报》的李醒我,以及《醒俗画报》的陆莘农,《北洋画报》的冯武越,《银线画报》的张圭颖等。

天津沦陷8年,王芸生在抗战期间内由《大公报》上海版而汉口版,最后为重庆版总编辑,他是由天津《商报》到《大公报》,即从天津开始他的记者生涯。天津籍的快手记者张高峰,抗战期内以报道黄泛区灾民实况一举成名,抗战胜利复员,又回归天津《大公报》。

日本投降后,天津报业一度繁荣。本书选择《大公报》副总编辑张琴南、《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都是既办报又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的学者型报人。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主任,在《大公报》当记者20年;薛不器创编报纸经济新闻版,评论经济问题,几度为天津市场上判断阴晴的权威人物。

这个时期著名的报人还有《大公报》的金诚夫、严仁颖、徐盈、彭子冈、林墨农,《益世报》王研石、李寿朋,《新星报》张隆栋、陈封雄,《新生晚报》张道梁、马际融,《民生导报》刘子威等。

本书各篇只是根据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多年积累的資料,综合整理而成。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全国政协和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发表过的部份资料,《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印的《新闻史料》以及有关报刊资料,主要是尽可能多汇集有关这些人的史实。至于如何在一定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下对这些报人作出恰当的评价,将有待于高明之士。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目 录

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
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
近代天津十大寓公
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
近代天津十大影棚家
近代天津十大买办
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近代天津十大京剧名票
近代天津十大曲艺家
近代天津十大戏曲家
近代天津十大学人
近代天津十大银行家
近代天津十大军事名人

目 录

总序	黄炎智(1)
序	徐景星(5)
创办《大公报》的英欽之	赵永生(1)
论坛宗师张季鸾	徐铸成等(25)
报界巨子胡政之	曹世瑛 汤 恒(64)
“大公报”——王芸生	王 鹏(103)
爱国报人张琴南	刘洪升(138)
重振《益世报》的刘豁轩	徐景星(151)
不平常的报人周拂尘	涂培元(176)

文苑奇才吴云心

杨大辛(200)

马敌殉报的刘舜公

王喆夫(221)

我与新记《大公报》

曹世璞(239)

正直敢言的张高峰

张道梁(273)

精通商情的薛不器

刘炎臣 吴云心(289)

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

赵永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还在掌握大权、光绪皇帝尚被幽禁之际,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竟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公开呼吁慈禧撤帘归政。该报还对慈禧的党羽和贪官污吏大张挞伐,甚至公然与靠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宠信和重用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相对抗。《大公报》因此赢得了“敢言”的



英 敛 之

美名,并成为华北以至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报纸之一;创办和主持该报并不断在报上发表政论文章的英敛之,也以敢于讥弹时事、警斥奸邪而成为受读者欢迎、权贵侧目的风云人物。

英敛之何许人也?他是怎样创办《大公报》的?在那慈禧专权、封建专制的年代,他又为什么敢于放言议论朝政、触犯权贵而未遭杀身之祸?关于英敛之的生平以及和他有关的一些历史事件,过去有些书刊曾作过零散介绍;但往往是一鳞半爪,难见

全豹。现将其综合整理撰成此文，以期有助于对英敛之其人和他的功过是非能够作出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评价。

出身正红旗 习武学文半生潦倒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于北京。幼年家境贫苦，全家生活靠他的父亲和长兄从事体力劳动来维持。他在少年时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予以家贫亲老，无以为养，兼之多事待了，债负满前，每以拙于生计为忧。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时，得补粮饷，尚为一线之路。所以不惮烦苦，每日挽六力弓逾百磅也。但祝彼苍，悯予苦心，曲赐矜全，则一技有托，不复奢望矣。”^①按满清旧制，八旗子弟是清军的主要兵源，而英敛之的少年习武，准备入军籍，则是为了借以获得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据他后来在《也是集》的“自序”中说：经过一番勤学苦练，居然达到可以举起300斤巨石、挽十二力弓、马步之射十中其九的水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认识到，上述伎俩已经“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于是在20岁左右即弃武学文。他的学习方法，一是刻苦自学，二是博览群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

英敛之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无意中接触到了明末来华传教士撰写的有关天主教教义和哲理的著作。经过潜心研读，他认

^① 转引自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为这些著作所讲的内容，“与世间词章、考据、名教、象数诸学，有天渊之别”，是“身心性命之源，诚正修齐之本”，就在22岁时信奉了天主教。30岁左右，经他的一位老师介绍，与出身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的女子结婚。

赞同康梁变法维新主张

这时正值康梁变法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英敛之受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影响，于1898年4月写了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表示赞同康梁的主张。9月发生了“戊戌政变”，谭嗣同等6人被杀，康梁逃亡海外。英敛之恐受株连，也从北京逃至天津，又乘轮船转赴上海。他在轮船上曾与康有为相遇，并且彼此进行过交谈，却不知姓名。由此可见，他虽附合康梁维新派的主张，但在组织上与他们并无联系。

英敛之到上海之后，直至1900年2月才靠其粗通法语，谋得了一个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的职业。蒙自县在云南南部，是法国天主教势力渗透较早的地区之一，以前曾经发生过烧教堂打神甫的事件。英来到这里之后，又传出当地民众将继续闹事的风声。不久，又传来北方各省兴起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动荡的时局使置身西南边陲的英敛之惴惴不安，遂决意离蒙自北返，于7月中旬取道越南、香港、上海，行程一月有余方才回到了天津。当时的天津，经过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已是满目疮痍，百业凋敝。他一时在天津谋不到职业，欲返回北京，又因战乱之后，交通受阻而不能如愿。乃于当年10月中旬携妻带子，随同天主教遣使会驻上海办事处的法籍神甫白嘉禄

再赴上海。来到上海之后，仍然找不到职业。上海这个西方冒险家的乐园，物价昂贵，使得英敛之全家的生活难以为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应聘为英国人温伯彦、比国人欧某和德国人翁德林充当家庭教师，每天早午晚分别到三个家庭去教“官话”（汉语）一小时，靠各家每月付10元钱的学费来养家糊口。此时，英敛之已过而立之年。他自幼家境贫寒，生逢乱世，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又一直为生活问题所困扰，可谓半生潦倒，历尽艰辛了。

与天主教堂总管合作筹办报纸

1901年4月，英敛之辞去单调乏味的家庭教师工作，离开上海回到了天津。三日之后，在他拜访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的时候，柴提出他准备在天津办一家报纸，资金问题由他负责解决，办报的具体工作则请英敛之主持其事。柴天宠是个信奉天主教的资本家，原来只经营一个出售建筑材料和承包建筑工程的“天和号”。义和团运动遭八国联军镇压失败之后，天津天主教会获得了巨额赔款，于是大事用金钱收买人入教，并大兴土木修复和建造教堂。柴天宠靠承包天主教堂和教会房产的工程而大赚其钱。由于资金日益雄厚，又投资经营其他工商企业。当时的紫竹林教堂是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天津市以及津南数县的天主教会皆属其管辖。柴天宠身为紫竹林教堂总管，天津天主教会的资产财务、对外交往以及教务活动等都须由他经手办理。在那洋人和洋教气焰嚣张的年代，柴天宠称得上是有钱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英敛之对他提议办报之事很有信心，加以英本

人对办报也很感兴趣，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并决定立即分头办理有关事宜。筹集股金问题，除柴天宠允诺“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赔垫”之外，为报馆集资入股的还有：经营元庆木号兼做包工的王郅隆，经营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并开设恒义号洋广杂货店、万聚恒洋广颜料店、瑞记布庄的张连璧，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此外，鼓吹变法维新的著名文人严复也入了1000元的股。

负责报馆其他各项准备工作的英敛之，也在加紧奔走。首先，按天主教会的规定，神职人员或教徒要出版与天主教有关的书刊，必须事先申请教会当局批准。当时天津尚未成立教区，是隶属北京教区管辖的一个堂口，办报之事必须由北京教区主教批准。英敛之为办理这项手续，于1901年8月初专程赴北京拜见了北京教区法籍主教樊国梁。樊在听取了英敛之的办报计划之后，不仅表示同意办报，还入了10股。不久之后，他又通知英敛之说，法国驻华公使鲍渥也愿入股，但表示希望最好能将报馆设在北京。英敛之认为报馆如能设在北京，有法国公使的支持和保护，不仅报纸的规模可以扩大，而且信息也较天津更为灵通。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因馆址问题事关重大，须与天津的同仁共同商议方可定夺。于是立即写信向柴天宠等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并就馆址问题向他们征求意见。柴天宠在回信中表示：“设馆无论京津，津友皆愿，但求勿拒我等入股本为幸。”当英敛之于8月中旬再次见到樊国梁的时候，樊突然告诉英敛之说，他已令人设计报馆房舍的图纸，并已决定将其建在西什库教堂院内。樊国梁此举，无异于将报馆完全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报纸也将成为教会的机关报了。经与柴天宠、李敬宇等人商议研究之后，都认为樊国梁的上述决定欠妥。在樊国梁就此事向鲍渥征求意见时，